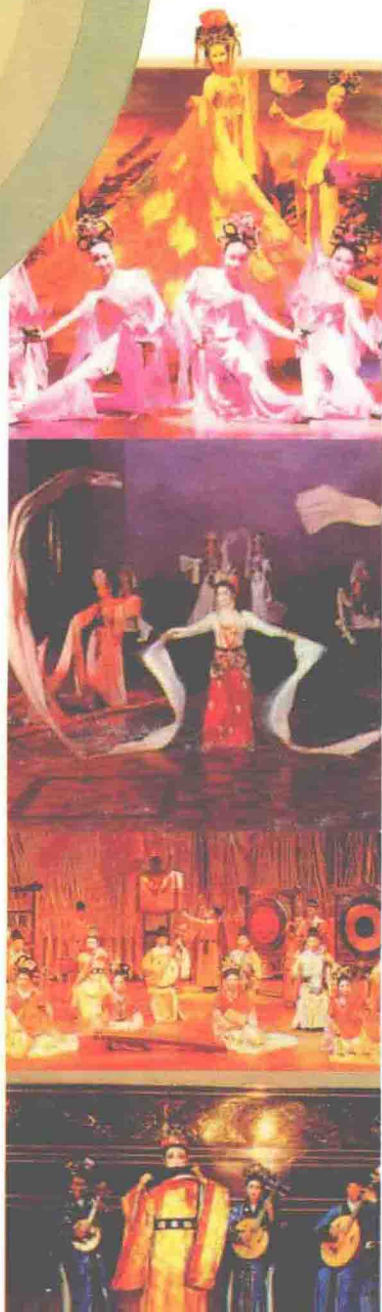


文化丛

当代青年文化丛书



曲艺

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

当代青年文化丛书
第四辑之九

曲 艺

余 钟

钟 余

编者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(桂)新登字 02 号

当代青年文化丛书

(第四辑之九)

曲 艺

余 剡 编著

责任编辑 侯志忠

封面设计 祖 琛

责任校对 侯志忠

技术设计 蓝剑风

出版发行 广西民族出版社

印 刷 湛江日报社印刷厂印刷

开 本 787×1092 1/32 6 印张 120 千字

版 次 1996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10000 册

ISBN 7—5363—1891—X/G · 650

定价:5.98 元

目 录

曲艺发展的简要历史·····	(1)
曲艺的特点与分类·····	(25)
北方的评书与南方的评话·····	(28)
相声的形成与艺术特点·····	(47)
相声的改革与创新·····	(74)
山东快书与数来宝·····	(94)
独脚戏与谐剧·····	(104)
“白妞说书”话大鼓·····	(111)
苏州弹词与广东木鱼歌·····	(124)
北京单弦与广西文场·····	(133)
时调小曲与山东琴书·····	(139)
二人转与杂曲·····	(145)
少数民族曲艺简介·····	(150)
著名曲艺演员·····	(156)
朱绍文·····	(156)
裕德龙·····	(160)
焦德海·····	(161)
李德锡·····	(163)
刘德志·····	(164)
张寿臣·····	(165)
马三立·····	(169)

侯宝林.....	(170)
马 季.....	(171)
姜 昆.....	(173)
骆玉笙.....	(174)
蒋月泉.....	(176)
徐丽仙.....	(177)
唐耿良.....	(178)
孙书筠.....	(179)
白燕仔.....	(179)
新中国的曲艺事业.....	(180)

曲艺发展的简要历史

曲艺艺术的历史十分悠久，可以一直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“俳优”，在四川成都天回镇出土的东汉说书俑，也证明早在汉代我国就有了说书艺人。

曲艺艺术发展到唐代，出现了“俗讲”和“变文”。俗讲是寺院宣讲佛经的一种讲唱形式，采取通俗的语言，运用韵文、散文相同的文体，配上动听的音乐，演说佛经本义或者佛经故事。

盛唐以降，佛教在中国的影响日益扩大，寺院逐渐成为群众聚会的场所，各种杂戏也在寺院内外演出，于是“俗讲”也开始有了娱乐的性质，讲唱一些历史故事、民间传说和当朝时事。“变文”是“俗讲”文字的底本，指与图画相配合的文字，而那些画着天堂、地狱等的图画称为“变相”。变相类似今天的连环画，变文则类似连环画下面的解说词。其实俗讲的品种名目很多，大体可分为讲经、转变、议论、说话四种，并不是每种都有图相。其中转变的底本即是“变文”。

讲经文完全是宣传佛教教义，缺乏故事性。变文则大都有故事情节，即使是搬演佛经故事，也比较引人入胜。较著名的变文有《目连救母变文》、《王昭君变文》、《伍子胥变文》。或是宗教故事，或为历史故事，还有《张义潮变文》、《张淮深变文》这样的当朝时事变文。还有取材于民间传说的

变文，如《孟姜女变文》。变文对后世的曲艺艺术有着全面的影响。

唐代还产生了“说话”艺术，“说话”就是讲故事的意思，“说话”时用的底本称为“话本”，话本是故事的提纲和梗概。唐代的话本还只是话本的雏形，在题材上还依附于一定史实和传说，较少对现实生活的直接反映，但是也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，其结构和体制趋于定型。例如，开头有了“入话”的形式，结尾也出现以短诗收煞的形式。当中的叙述方式更是“说书”式的，在语言上接近口语，情节曲折跌宕，通过尖锐的矛盾斗争展示了人物的性格和心理。唐代说话的代表作品有《韩擒虎话本》、《叶净能诗》、《庐山远公话》等，另外还有“一枝花（即长安名妓李娃）话”和讲说名医扁鹊故事的。

唐代的说唱艺术形式还有俗赋和词文。俗赋基本上是四言的吟诵体，词文则只唱不说，为七方体。俗赋的代表作有《韩朋赋》、《燕子赋》、《晏子赋》、《孔子项托相问书》。

1. 宋代的“小说”

宋朝的曲艺艺术十分繁荣，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，在许多城市中出现了专门供市民游乐的场所“瓦舍”，瓦舍中除去一些卖饮食的店铺外，主要是集合多种民间技艺，由职业艺人长年卖艺的地方，每个瓦舍中设有许多勾栏，供各种技艺分别演出。

宋代的“说话”是曲艺成熟的标志。流传至今的“说书”艺术，就是由它一脉相传下来的。宋代的说话已经摆脱

了唐代俗讲的宗教内容，主要是讲述历史故事、民间传说、现实生活中的奇闻轶事。讲述者不再是寺院里的高僧，而是以艺谋生的“说话”艺人。

“说话”有两大门类：“小说”讲述现代生活，篇幅短小精悍，一般作品只说一次，至多几次，以一人一事为主。“小说”的语言通俗、上口，内容也是当时一般市民所关心熟悉的。因此，它反映了宋代的社会生活，涉及了阶级压迫，民族矛盾和社会风情，有着相当深刻、丰富的认识价值，是了解宋代社会的形象“图画”。

“小说”也叫“银字儿”，它的体制包括题目、篇首、入话、头回、正话、篇尾等几个部分。题目成为以后章回小说“回目”的起源，篇首通常以一首诗词开头，以点明主题、概叙大意、渲染气氛，并抒发作者感情，其中多有说教、劝善的痕迹。入话是由篇首向正话的过渡，当入话和头回采取一个独立故事的形式，以和正话相同或相反的色调进行烘托或反衬时，这个短小有趣的故事便是“得胜头回”，或称“笑耍头加”，成为正话的生动铺垫。正话是小说的主要部分，情节发展波澜起伏，环环相扣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或采取单线结构，或采取分头并进的结构，明叙、暗叙、补叙错落有致，并时而穿插诗词、铺排韵语，使语言和手法丰富多样。一回以上的“说话”要在结尾处留下悬念，系牢“扣子”，以便吸引听众再来，每回书的篇尾常以“惊人笔”掀起尾潮，使矛盾冲突达到高潮。篇尾常由说书人以诗词形式总括全篇，点明主题，发表评论。

宋代小说的代表作很多，如《碾玉观音》通过描写裱裱匠的女儿璩秀秀和碾玉工人崔宁的不幸遭遇，揭露了封建统

治者对小手工业者的剥削和压迫。《错斩崔宁》则揭露了封建官府草菅人命，造成冤案的罪行。《快嘴李翠莲记》描述了一个敢于同“三从四德”等封建礼教抗争的青年妇女李翠莲的故事，人物性格十分鲜明。

宋代“小说”是短篇白话小说的前身，它的底本——讲述小说时的提纲梗概或文字记录，后人称为“话本”。文人仿制“话本”所写的小说称“拟话本”或“话本小说”。它在明清两代风靡一时。

说话的另一大门类是“讲史”。“讲史”是讲述历代兴衰的长篇大书，它由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发展而来。“讲史”虽然以史为本，却不拘泥于史实本身，而是与民间传说融合在一起，反映了我国古代以文为史、文史不分传统观念。“讲史”书中溶进了人民群众的艺术加工，反映了人民的理想和愿望。

“讲史”的内容，据史书记载有“孙庞斗智、刘项争雄、三国志、说黄巢、说狄青等。”（《醉翁谈录》），南宋时还有说当代时事，“说张（俊）、韩（世忠）、刘（琦）、岳（飞）。”这四大将是南宋初年抗击金兵的名将，艺人们把他们的战绩敷衍成故事，以此来鼓舞人民群众抵抗金兵的斗志。由此可见，在阶级矛盾、民族矛盾极其尖锐复杂的时期，说话艺人演说兴亡、选取题材总是从现实出发，以历史来隐喻现实的。

宋代讲史话本流传至今的有《新编五代史平话》和《大宋宣和遗事》。《大宋宣和遗事》中梁山泊聚义的部分乃是现存水浒故事最早的资料，为后世《水浒传》勾出了基本轮廓。

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》是现存南宋瓦肆中的说经话本，也是最早的将唐代玄奘取经事迹演绎为神话故事的作品。

宋代的“说话”中还有“说诨话”、“说诨经”以及“合生”、“商谜”等名目，是一些诙谐有趣的故事或语言文字游戏，可惜没有更多的资料记述。

宋代以唱为主的曲艺形式有唱赚、覆赚、诸宫调、弹唱因缘、小唱、嘌唱、唱耍令、叫果子、唱京词等，还有流动的艺人唱涯词、陶真，士大夫宴乐中有鼓子词（又称唱道情）。

“陶真”是宋代民间流行的一种说唱形式，它流传很久，一直到元、明以至清代，民间还在演唱。南宋诗人陆游曾写过《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》，其中第四首写道：

斜阳古柳赵家庄，负鼓盲翁正作场。
死后是非谁管得，满村听说蔡中郎。

这是描写一个盲艺人在农村演唱蔡伯喈和赵五娘的故事。一般学者认为这种唱故事的形式就是“陶真”。由此可见在当时浙东农村流行的情况。

还有一种“涯词”，大概是演唱烟粉、灵怪一类题材的唱曲，文献上有“唱涯词只引子弟，听陶真尽是材人”的记载，（见《繁胜录》）说明涯词和陶真有各自不同的观众群。

宋代是中国曲艺艺术的繁盛时期，各种曲艺演出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，《新编醉翁谈录（卷之一）》中曾谈到宋平话的艺术效果：

说国贼怀奸从佞，遗愚夫等辈生嗔；说
忠臣负屈衔冤，铁心肠也须下泪。讲鬼怪，令

羽士心寒胆战；论闺怨，遣佳人绿惨红愁。说
人头厮挺，令羽士快心，言两陈对圆，使雄
夫壮志。

2. 元明的讲史、平话

金、元时代的说话艺术不如宋代兴旺发达，在元代人的著作中，再也见不到像《东京梦华录》中记述的盛况了。小说在元代呈现衰落的现象，但讲史一类的说话却比较发达，出现了《全相平话五种》、《薛仁贵征辽事略》、《吴越春秋连象平话》等话本。

《全相平话五种》包括《武王伐纣书》、《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》、《秦并六国秦始皇传》、《吕后斩韩信前汉书续集》、《三国志》。《全相平话》是民间色彩很浓的作品，文字大都简陋而不通顺，别字破句连篇累牍。虽然书中记叙述的是历史，却有许多无稽的传说，神怪的奇谈。如《全相平话三国志》一开头就写汉末之所以分裂为三国，是因为汉高祖刘邦得天下后把韩信、彭越、英布三个功臣诛杀了，他们的冤魂到天上告状，上帝让秀才司马仲相来判断案情，司马仲相于是让三人托生为曹操、刘备、孙权三分汉朝的天下报仇。上帝因为司马仲相断狱公平，又让他托生为司马懿，削平三国，这便是三国之所以合而为一晋的缘故。《全相平话五种》宣扬了反暴君、褒扬忠义、诛斥奸佞的思想，还反映了人民群众在封建统治下的悲惨遭遇。元代讲史话本直接孕育了后日长篇小说的诞生，像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、《水浒》、《封神演义》、

《东周列国志》都可以在元代话本中找到原始雏型。

诸宫调在宋金对峙时期已经相当成熟，出现了不朽的佳作——董解元的《西厢记诸宫调》。它虽然取材于元稹的《莺莺传》，但无论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和突破。《莺莺传》的作者公开宣扬美丽而聪明的女人是“天之所命尤物”，“不妖其身，必妖其人”，因此，那个“始乱之，终弃之”的张生的负心行为是合理的。《董西厢》则从根本立场上站在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莺莺一边，由同情她的遭遇，导致支持她的爱情，着力表现了她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和对爱情的大胆追求。张生也被改写成始终忠于爱情的人物。《董西厢》在情节的安排、性格的塑造、语言的运用上都是十分出色的，它是元代说唱艺术中的明珠。诸宫调作品除《西厢记》外，还有《刘知远》和《天宝遗事》流传下来，而《离魂倩女》、《柳毅传书》等则没有能够保存下来。

“诸宫调”一名的意思是指由不同宫调的只曲联缀而成，形成大型套曲的说唱艺术形式。诸宫调出现于北宋，繁盛于南宋、金、元，在元代中叶之后逐渐消亡，估计是被它进化后的姊妹艺术——元杂剧所同化，例如《西厢记诸宫调》就成为元人王实甫同名杂剧的蓝本。

3. 唱曲的演变

明代统治阶级在严格限制各种民间文艺的同时，仍然允许各种对统治者有利的“劝善”之作，因此，各种传奇、说书、词话仍在民间流行，连皇亲贵族也以听书为娱乐。在《如梦录》中，记载着明代开封市俗，其中就有：

相国寺每日寺中有说书、算卦、相面，百艺逞能，亦有卖吃食等项。

在清初成书的《说岳全传》中的第十回“大相国寺闲听评话”中，虽然写的是宋代故事，实际具体描写的却是明代的情景。在明代成书的《水浒》百二十回本，第一百一十回“宋江东京城献俘”中，也有类似的描写，都是以明代说书的实际情况进行描写的。

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，在明代的话本中出现了许多表现工匠、商人、下层知识分子的生活，有的揭露统治阶级的内幕，有的描写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，或是讲述发迹的故事，自两宋以来的理学难以束缚人们的思想，在社会上，正酝酿着追求自由、平等的思想。到了明中叶，以“三言”（即《喻世明言》、《警世通言》、《醒世恒言》和初刻二刻《拍案惊奇》为代表，由口头的说唱艺术发展为正式的书面文学——拟话本。

当时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大批新知识分子，生活环境促进他们与说书艺人结合，投身到搜集、整理这些民间流行的说书底本，或改编、新写一些话本。再加上印刷技术的不断提高，使书商把眼光转向刊印说书脚本方面，于是有大量宋元以来的话本刊行。有些书坊主人（或请些文人）根据各种材料编写新本，充当传统话本；有时为了投合某些读者的口味，将过去的旧话本改头换面，或略加改动，冠以“新编”的字样出版发行，于是除过去只能依靠说书艺人表演、听众听书的欣赏形式外，又开辟了阅读话本的形式。

《清平山堂话本》刻于嘉靖年间，分为六集，每集十篇，共六十篇，所以也称为《六十家小说》，该书是我国最早编辑的话本集。

明代话本中最著名的是“三言”、“二拍”。“三言”由冯梦龙编辑，收入部分宋元旧作，也有冯梦龙根据当时流传故事整理、改编的话本，由于这些作品已成为供人阅读的小说，仅在形式上模拟话本，所以称之为拟话本。“三言”中著名的篇目有《金玉奴棒打薄情郎》、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》、《卖油郎独占花魁》、《白娘子永镇雷峰塔》、《俞伯牙摔琴谢知音》等。

“二拍”是《初刻拍案惊奇》和《二刻拍案惊奇》的合称，由凌濛初编纂。由于宋元旧话本大部分都被冯梦龙编入“三言”，凌濛初编“二拍”，只得“取古今来杂事”进行“演而畅之”，实际上就是由他自己进行改编和创作。

到了明末清初，这种据“古今来杂事”创作小说的风气兴盛，出现了大量模仿话本形式的小说创作，其中著名的作品集有《石点头》、《醉醒石》、《西湖二集》、《照世杯》、《连城壁》、《十二楼》、《无声戏》等，基本上已属于古代短篇白话小说的范围了。

宋、元以来的“讲史”到了明代，发展、演变为长篇历史演义，形成了我国最早的几部长篇小说。如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封神榜》等。

“三国”的故事早在魏晋时就已在民间流传，晋朝人陈寿作史书《三国志》。记载了大量的历史事件，宋朝人裴松之为《三国志》作注时，又采集了许多有关的佚事、传说。唐代大诗人李商隐的《骄儿诗》中有“或谑张飞胡，或笑邓艾吃”的句子，说明在晚唐时期，三国故事已经在民间广为

流传，连儿童都很熟悉了。宋代有了“说三分”的专门科目和专业艺人，苏轼《东坡志林》中记载：“涂巷中小儿薄劣，其家所厌苦，辄与钱，令聚坐听说古话。至说三国事，闻刘玄德败，颦蹙有出涕者；闻曹操败，即喜唱快。”可见当时小听众听说“三国”时的生动状况。

到了金、元时代，三国故事更被大量地改编为戏剧，元杂剧中的三国戏约有四十多种，像桃园结义、过五关斩六将、三顾茅庐、赤壁之战，单刀会、白帝城托孤等重要情节，在元杂剧中都具备了。

元末明初人罗贯中依据《三国志平话》，又参照社会上流行的“三国”故事，最后写成了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这部语言简洁、明快、生动，人物性格鲜明，具有很高艺术水平的章回体长篇小说。

“水浒”的故事取材于北宋末年我国北方发生的以宋江为首的一次农民起义，南宋时水浒故事已经成为“说话”艺术的重要题材，罗烨的《醉翁谈录》中，就记载了《石头孙立》、《戴嗣宗》、《青面兽》、《花和尚》、《武行者》等话本的名目。宋元之间的《大宋宣和遗事》主要是节录南宋的历史著作和故事传说拼凑而成的，其中有一部分专讲梁山泊聚义，简述了“杨志卖刀”、“智取生辰纲”、“宋江杀惜”、“九天玄女授天书”、“败呼延绰”以及“受招安、征方腊”的故事梗概。在元杂剧中，也出现了《黑旋风双献功》、《同乐园燕青博鱼》等内容，并已初具梁山泊“一百单八将”的规模。

《水浒传》的主要作者一般认为是元末人施耐庵，据传说他曾参加过张士诚领导的农民起义军。施耐庵在前人创作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创作，将“水浒”中众多英雄的故事联缀成

为一部长篇小说，小说仍然采取话本的形式，并有多种版本，大致可以分为简本和繁本两个系统。

《西游记》和《封神演义》的创作，同样有一个由话本至小说的转变过程。如《西游记》的内容与《大藏三藏取经诗话》有着承接关系，而《诗话》中的取经故事远离历史事实，吸收了许多神话传说，显然是民间说话的一种底本。而《封神演义》基本上是对《武王伐纣书》的扩充和敷演。

其它许多长篇历史小说也都经历了由话本演变而来的变化过程。正如陈汝衡先生在《说书史话》中“元明说书”一章中指出的：“话本盛知，说明了：一、说话人需要它们作为观摩参考和职业上的工具；二、市民阶层需要它们作为书场听书之外的补充读物。”说书艺术和话本小说确实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。

随着传统话本先后被改编，使小说素材的来源日趋穷尽，所以在明代中叶出现了文人创作小说。第一部文人创作的小说《金瓶梅》于万历、天启年间刊刻出版。《金瓶梅》以描写官僚、恶霸、富商三位一体的西门庆及其家庭的罪恶生活为主要内容，借《水浒传》中“武松杀嫂”一段故事为引子，作品揭露了明代后期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败，有较重要的认识价值，书中也有许多淫秽描写。

这种文人创作的小说仍然继承了章回体的话本形式，对书中情节和人物的描写，也都沿袭了话本的创作技法。明末清初出现了一批才子佳人小说，如《玉娇李》、《平山冷燕》等。吴敬梓的《儒林外史》、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的问世，标志着我国古典小说彻底摆脱了说书因素，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。

清代人蒲松龄创作的《聊斋志异》为短篇文言小说，多

取材于民间传说。清代人创作的《说唐全传》、《说岳全传》等历史小说和《施公案》、《包龙图案》等公案小说，以及《济公传》，也为说书艺人提供了表演的脚本。

《说岳全传》描述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故事，作品广泛汲取元明戏曲小说和民间说唱中的故事，进行了大胆的再创造，使作品情节曲折，人物形象鲜明。《说唐全传》是一部广泛流传于民间的历史小说，它以隋末农民起义军瓦岗寨诸将为中心，吸取民间传说，叙述了隋末“十八路反王”、“六十四处烟尘”中一批英雄的传奇故事。作品集中塑造了秦琼、程咬金、罗成等人物形象，作品语言通俗生动，风格粗犷，保留了不少说书艺术的特点。

《施公案》主要写康熙年间江都知县施仕伦审案的故事，穿插了一些绿林好汉的活动，作品着力塑造并歌颂施仕伦以及官府鹰犬黄天霸的形象，极力宣扬封建伦理道德，维护封建统治。

《包龙图案》的作者传说是清代道光、咸丰年间的旗籍艺人石玉昆，作品为系列化唱本，描述包拯的生平及破案断狱的故事。后人在《包龙图案》的基础上删去唱词，改为白话取名为《龙图耳录》，又增饰、敷演了有关侠义的情节，并更名为《三侠五义》。其中“三侠”指南侠展昭、北侠欧阳春、双侠丁兆兰、丁兆蕙。“五义”指号称“五鼠”的钻天鼠卢芳、彻地鼠韩彰、穿山鼠徐庆、翻江鼠蒋平、锦毛鼠白玉堂。《三侠五义》是“公案”小说和“侠义”小说结合的典型，着意于歌颂“清官”和“侠客”。多取材于民间传说，因此鲁迅先生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说它“绘声状物，甚有平话习气”。说书艺人中也多有说《三侠五义》的。